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邹翔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质量完成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各项任务,才能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强化统筹协调,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方能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不断健全,目前近70%的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就业帮扶年度目标任务超额完成,截至5月底,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务工规模3133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3.8%;新增发放小额信贷超过250亿元,支持57.3万脱贫人口发展产业……今年以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应当清醒看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来挑战。强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强化稳岗就业、产业帮扶,强化社会帮扶和驻村帮扶……前不久,国家乡村振兴局制定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措施》,为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注入强劲动力。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如今,“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

□王志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口罩依然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口罩的广泛使用,也产生了大量的废弃口罩,掌握科学的处理方法十分必要。

调查显示,59.8%受访者表示找不到专门处理废弃口罩的地方,49.9%受访者认为缺乏科学的处理方法。76.1%受访者希望加强宣传,提升居民的处理意识;72.9%受访者建议设置专门回收废弃口罩的垃圾桶。

家住江苏淮安的严小龙表示,在家附近,从来没有看到专门的废弃口罩回收点或



村振兴上来,但脱贫地区防止返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比如,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不稳固;有的脱贫户政策性收入占比较高,自我发展能力还有不足,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一旦扶持政策断档就可能返贫;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让脱贫群众稳岗就业难度加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还需拿出更有力的举措、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同时,防范化解返贫风险这根弦须臾不可松,特别需要警惕“喘口气、歇歇脚”的松懈念头。

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稳住了岗位、实现了就业,防止返贫致贫就有了坚实支撑。此前,《关于做好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通知》从深化劳务协作、促进就地就近就业、组织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进专项行动等方面,对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作出部署。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从确保今年全国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

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到对返乡回流的脱贫劳动力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分类落实帮扶责任,再到加大对脱贫劳动力、监测对象就业稳岗支持力度,政策组合拳将脱贫群众的生活保障网织得更密、编得更牢。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质量完成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各项任务,才能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担当作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一些农户面临返贫致贫风险,要及时将他们识别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做到应纳尽纳,对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因疫情收入骤减的脱贫户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增收。发展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治本之策。对脱贫户发展产业给予重点支持,优先保障到户项目资金需求,促进脱贫人口、监测对象持续增收。对符合规定的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运营困难的帮扶企业,可通过衔接资金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帮助解决流动资金困难。强化统筹协调,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到位,方能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措施尽快落地见效,不断增强脱贫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面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团结拼搏、顽强奋斗,我们一定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推动巩固脱贫攻坚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

(摘自《人民日报》)

科学处理废弃口罩防止二次污染

垃圾桶,每次在丢口罩时,都会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扔在哪里,最后只能选择跟生活垃圾一起扔掉。“内心始终觉得不太妥当,上面会有一些飞沫和细菌。如果大家随意乱扔,风险隐患也会增加。”

合肥某高校护理专业大四学生王秘密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口罩作为人的直接接触物,最好能按照专业的方法处置”。她对环

境问题表示了担忧,“我不太清楚丢弃的口罩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但作为一种塑料制品,处理不好,肯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表示应加强垃圾点的消毒工作,防止二次感染,33.8%的受访者希望建立规范化处置废弃口罩的长效机制和预案。不管怎么说,数量如此庞大的废弃口罩需要引起关注。(摘自《中国青年报》)

史海钩沉

汪物

1912年,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型邮轮撞上冰山,三等舱的乘客方荣山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求生。《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拍摄,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氏家族间口耳相传的“海难逃生”传奇,穿过汪洋大海,解答了方荣山妻儿脑海里的疑问,也补全了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历史。

下南洋

台山人的移民热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为最初的目的地都是现在的东南亚一带,也被称为“下南洋”。这其中,有人被欺骗、胁迫后贩卖至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成为做苦力的“猪仔”,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在海外娶妻生子,也无法回乡。绝大部分孤零零地在异乡死去。

比“猪仔”幸运些的,是“除单华工”。他们可以在招工公司赊着账,免费登船,公司先承担衣食住行的费用,借的账按月从工资扣除,只有还完了钱,才能自由往来家乡。方荣山在台山的后人,方萃群和朱红品都提到,方荣山并非自由移民,他是“猪仔”,“那时家里贫困不堪,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常要在岛上挖野菜充饥。”他们猜测,“方荣山下南洋,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

直到今天,前妻谭亚凤都认为方荣山是个神秘的人。1955年,二十岁出头的谭亚凤经由表哥介绍,嫁给了60岁上下的方荣山。在香港成婚后,二人一同前往美国。那时,除了“方荣山”这个名字,谭亚凤对那时未婚夫一无所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人离婚,孩子们跟着谭亚凤生活。

上学时, Tom Fong 每周都会抽出一天,乘坐公交车前往父亲的住所。在那个狭小而干净的公寓里,父亲提起笔教他写中国汉字。父亲从不提及过去,他也不会问。直到2003年,平静被打破。那时,他和表弟一同参观“岩上之屋”的展览。走到泰坦尼克号的展览物前,表弟突然提起,方荣山以前上过这艘船。Tom Fong 感到震惊,他想起了很多往事,儿时参加的聚会上,也

□崔鹤同

1949年12月,傅雷从北京回到了故乡上海。那时,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农民,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一个“单位”,有工资,有住房,有公费医疗,退休了有薪金。

但傅雷与众不同,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他在户籍上填写的职业是“人民文学译著”,而“单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出版他翻译的世界名著而已。

傅雷的资历和声望,找个单位,找个公职,或者搞个兼职,易如反掌。但傅雷只想“凭力气”吃饭,靠闭门译述的稿费维持

□徐远

周其仁教授出访以色列,传回随手拍的照片——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着数不清的整齐的墓碑。其实,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显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两侧,并不是特有现象。经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记载,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之外,来访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类早期就已经显现。早在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还以狩猎、采集、打鱼为生,过着随遇而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最早获得固定居住地的却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经逝去的人。墓地,是人类最早的定居所。据芒福德推测,因为逝者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使得人们对于死去的人心存敬畏,因而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当时居无定所的人们,依然会经常回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为人们最早的聚集场所。

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村庄之前,墓地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

把墓地和村庄作个比较,会很启发。村庄是静态的,历经千年而变化甚微;村庄也是封闭的,对于外来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而墓地则不太一样。人们回到墓地,并不是因为任何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那里埋葬着寄托。墓地里存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带来的却是无形的吸引力。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雏形。墓地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会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城市和墓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磁体”功能。墓地早于村庄而存在,因此磁体功能亦是先于容器功能而存在的。从墓地进化到村庄,则是在磁体功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容器功能。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城市,是容器也是磁体

“磁体”功能先于“容器”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故乡”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封闭的村庄因而被“打开”。种植、建筑、加工制造、水电、医疗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则大大下降了。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体”功能都继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体”功能变得相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们会聚到哪里?聚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

工业革命以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城市,而是会停走走,具有多个“故乡”。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持久保留吸引力,才能保持繁荣。比如说,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则因为缺乏对新鲜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千丈。相反,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则持续保留了“磁体”的吸引力。

(摘自《人·地·城》)



刘诗昆的启蒙老师

□龙飞

刘诗昆1939年生于天津富商家庭。父亲刘啸东喜爱音乐,曾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经商。他发现儿子有音乐天赋,决心培养儿子。为了刘诗昆学琴,家里置了四架进口钢琴,上万张唱片。儿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放唱片给他听,告诉他曲名,让他记住。

成为钢琴大师后,刘诗昆说:“小时候我不喜欢学琴,是父亲强制我学的。还不满三岁,父亲把我抱在腿上弹琴,我也不能跑。”刘诗昆幼时是个顽童,父亲的棍棒逼他走上钢琴之路。家里给他请的老师是刘金定,她是20世纪40年代天津有名的私人钢琴教师。

同为刘金定学生的资中筠比刘诗昆年长九岁,她见过这个神童弹琴。那年他三多,是让人抱上琴凳的。他坐好后稚声稚气地问:“姑姑(父亲让他这样称呼),我弹什么呀?”刘金定说了个曲名,他就很投入地弹起来。全曲未完,他忽然说:“姑姑,下面我忘了!”然后自己从凳上溜了下来。

刘金定向大家介绍,他尚未识谱,全凭听,记得多少弹多少,他的耳朵好得惊人。于是她让刘诗昆当场表演:把他放在门口,有人随意按响一个琴键,他过来在琴上就准确地按了出来。大家为他鼓掌……

据刘金定说,刘诗昆天生音乐资质极高。一次,他弹莫扎特的奏鸣曲,原调是F大调,第一遍他按F大调弹,第二遍突然转成G大调。刘金定见他弹得很好,以后给他



为什么坐后排更易晕车

生活百科

这其实与我们的耳朵、眼睛合作不当有关。当我们乘车时,耳朵不只接收声音,还负责感知平衡和运动状态,它能感觉到身体在移动,尤其在急剧急停、转向、颠簸的时候,而这时的眼睛如果关注的是车内相对静止的事物,大脑就认为你的身体并没

有在动,这种矛盾让负责整合多种感觉的大脑犯了难,于是简单粗暴地下判断——你身体出毛病了,快点吐吧!

而坐在前排时,视野更加开阔,能看到窗外移动的物体,更好地协调视觉和平衡感。司机不易晕车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窗外的移动物体。因此,如果晕车,把目光转向前方车外移动的物体,症状会得到缓解。(摘自《大科技》)

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方荣山

曾有一位亲戚告诉他,父亲曾经坐船撞到过冰山,掉落到海里后,他找到了一块门板,取下身边浮尸身上的皮带,将自己绑在门板上,最后等来了救援。

方荣山? Fang Lang?

因为一封邮件, Tom Fong 开启了“寻父之旅”。邮件来自《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拍摄团队。在一个与泰坦尼克号相关的网站中,研究团队发现了 Tom Fong 和儿子的留言,他们自称是幸存者 Fang Lang 的后代。两周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州, Tom Fong 和研究团队碰面,向他们展示了父亲的照片,并告诉他们, Fang Lang 的真名其实叫方荣山。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研究团队根据资料考证,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曾有一艘折返的救生船,发现了一名浮在门板上的东亚面孔,他是整个泰坦尼克号上被救下的最后一人。据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透露,影片最后,女主角露丝靠着浮木逃生的桥段,便是来自这段素材。

但 Tom Fong 的信息来源,只是两位亲戚的口证。这让研究团队犯了难,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名单上,的确有一个叫 Fang Lang 的中国人,但怎么证明,方荣山就是 Fang Lang? 线索指向了广东台山,这是一座著名的侨乡城市。自18、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台山人漂洋过海,赴欧美、南洋等地生活。台山市2014年至2019年间开展的台山华侨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全市有163万台籍乡亲旅居海外及港澳台,而台山市常住人口却不到一百万。

通过查阅档案馆、博物馆里的资料,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研究团队锁定了 Fang Lang 有可能生活的村子——台山市下川岛水洋村。2018年,研究团队正式前往台山,开始拍摄。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很多方荣山的族人,听到了关于方荣山的另一面,而关于他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口证也越来越多。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在台山,还未提及任何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事情,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突然念起一首打油诗。方少英告诉研究团队,这首打油诗是从方荣山寄给自己父亲的信里看到的。这让研究团队兴奋了起来,并开始相信,他们越来越接近事实。

另一边,方荣山那位早已嫁到邻村的胞妹方树莲也在传递这一信息。她的孙子朱红品告诉研究团队,自己长到十来岁,会读书写字之后,便承担起读信、写信的任务。他记得,这是大舅公在信里写过最大的一件事。之所以记忆这么深刻,是因为方荣山的信一来,奶奶便会念叨起那场海难,“撞到冰山之后,船沉了,他抱着一根木头,在海里浮了好久,被别人发现时,已经快要死了,最后被医生救了。”

海难之后

研究团队查阅资料发现,在这场海难中不幸遇难的两名华人,是和方荣山结伴渡洋,相约一起做生意的伙伴。在 Fang Lang 填写的遗失物清单里,也写着领带、领结、西服等物品,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要在船上当水手,终日劳动的人。海难让一切化为乌有,方荣山只能重新开始。在一艘运输水果的货船上,方荣山当了8年水手,之后终于入境美国。在美国,他两次创业,开洗衣房、开餐厅,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生活也格外清贫。

尽管如此,他总是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Tom Fong 记得,父亲总是精神抖擞地走着路,手上还戴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玉戒指。

在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中,方荣山无疑是幸运的。此后的人生,他娶妻生子,还活到了耄耋之年。离婚后,他独自租住了一个顶楼的小公寓。孩子们跟着前妻生活,长大后也难以相聚。他在寄回家乡的信件上写:“国光、国民两儿在别处工作,大约百里路之远,不能常见,只由长途电话、谈话而已。”(摘自《新京报》)

没有“单位”的傅雷

生计。他的稿酬除了吃穿用度,每月还要支付房屋租金55.29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

傅雷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一直工作到7点。晚上看书或写信。每周译书6天,周日名义上休息,其实是用来写信。

傅雷动手翻译前,总是把原著看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了,这才开译。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

从不马虎。他往往写信向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到1939年,花了3年工夫译毕。20世纪50年代初,他竟又用了近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傅雷1929年起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一生所译世界名著达30余部。而且,他不但能译文学名著,又能译《艺术哲学》《贝多芬传》这样美术、音乐方面的著作。

(摘自《人民政协报》)